

要 目

纪念蔡元培先生

——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

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

蒋介石派我回西康的前后

中统与我

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
活动情况

海军生活见闻

五四新文学运动与“学衡派”

文学论争大事记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K210.6
2.110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辑

(总110辑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长赋 沈美娟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辑

(总110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

*

1987年8月第一版·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82千字

印数：1—11,000册 定价：1.55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·239

11224·239

目 录

· 忆 旧 谈 往 ·

纪念蔡元培先生……………梁漱溟（1）

——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

纪念梁任公先生……………梁漱溟（9）

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

任公先生的生平得失

我个人对任公先生的感念

写在《纪念梁任公先生》一文之后

回忆李大钊先生……………梁漱溟（16）

司徒美堂老人的晚年……………司徒丙鹤（20）

何香凝为美老撰写的墓志

漫长曲折的道路

上书毛泽东的经过

秘密经过台湾海峡北上

政协会议期间的北京饭店

侨领两老的会见

瀛台之宴

国号之议

开国大典

陈毅将军谈“上海之战”

紫禁城下六年

到广东侨乡视察土改

漫游祖国名胜
几项重大的政见
介寿堂的寿宴
隆重的葬礼
结束语

记中纺公司迎接解放的经过……………孙越崎（51）

· 政 坛 琐 记 ·

一九三〇年国民党扩大会议始末……………田象奎（54）

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的内幕见闻……………马建中（62）

败絮临风的前奏曲
瘫痪没落的国民党中枢
会场内外见闻

蒋介石派我回西康的前后……………张练庵（70）

面授机宜
近忧远虑
打入西康
稳定局势
审时度势
密谋起义
巧度难关
起义经过

· 特 务 内 幕 ·

中统与我……………孟 真（98）

陈赓新在军统……………毕 骥（113）

前言

张学良将军的亲信
为什么参加军统
“放牛图计划”成泡影
再建东北集团实力的落空
寄托于民主的妄想
一张不生效的释放令

在镇压“春荒暴动”的掩盖下……………刘崇朴 (137)

事件真相
绑架
戴笠飞蓉
血腥镇压

· 洋 行 幕 后 ·

德商礼和洋行在华经营军火活动情况……………丁福成(147)

- 一、南京礼和洋行成立
- 二、礼和洋行的地位和背景
- 三、德国顾问和礼和洋行的关系
- 四、经售军用物资及所得利润
- 五、怎样向国民党政府兜售生意
- 六、在竞争中施展手段
- 七、欺骗敲诈
- 八、贵重武器竟遭弃置
- 九、日寇占领南京
- 十、抗战胜利以后

· 海 军 史 话 ·

海军生活见闻……………周应骥述 李蓬洲记 (168)

- 一、我的童年
- 二、烟台海校生活
- 三、在南京海校学习
- 四、上舰实习
- 五、在海军租船处
- 六、迎接北伐军
- 七、在血雨腥风之中
- 八、赴英国学习海军
- 九、在朴次茅斯海军基地学习
- 十、任教练员期间
- 十一、随特使代表团出国
- 十二、“八·一三”以后

烟台海军学校.....魏应麟（197）

- 创始的情况
- 学校教育的情况
- 张宗昌勒令解散烟台海校

· 资 料 ·

五四新文学运动与“学衡派”文学

论争大事记.....孙玉蓉 王爱英(204)

· 忆旧谈往 ·

编者按：梁漱溟先生（生于一八九三年）是我国著名学、哲学家、爱国民主人士。这里刊出的是他忆旧谈往的三篇文章。其中《纪念蔡元培先生》写于一九四二年，一九七〇年、一九八四年又四次写下了附记；《纪念梁任公先生》写于一九四三年，一九七六年又写了后记。《回忆李大钊先生》写于一九七九年。耄耋老人追心其相与相知的历史名流，自有其独到之处，弥足珍视。

纪念蔡元培先生

——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

梁 漱 溟

民国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，《文化杂志》以时届蔡先生逝世二周年，属为纪念之文。愚于蔡先生逝世之初，曾为一文发表于重庆《大公报》，大意申论中国近二三十年之新机运蔡先生实开之。今不重述。今只述蔡先生的伟大兼及愚个人知遇之感于此。

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，不在事功，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，酿成一大潮流。影响到全国，收果于后世。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，而是运会来临，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。然而数起来，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。

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，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，好多旧事物于此结束，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，在社会人生、在经济、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，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

潮流者不同。而中国呢，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，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、清室复辟运动，此伏彼起，新旧势力相搏之际。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、南北统一内阁之下，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范先生原是蔡先生作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，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。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，新旧资望备于一身。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，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，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，一面普遍化，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，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，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。

这还不单是说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，蔡先生的资望品概能服人而已，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。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，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，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。虽然关涉政治制度、社会体俗的像是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民主”一类观念，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，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。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，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。讲到他的器局、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，便从这里可见。因其器局大，识见远，所以对于主张不同、才品不同种种的人物，都能兼容并包，左援右引，盛极一时。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，一大潮流的酿成，亦正孕育在此了。

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，时下论者多能言之，但我愿指出说明的：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，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，极广博的兴趣。意识到此一需要，而后兼容并包，不免是人为的（伪的）；天性上喜欢如此，方是自然的（真的）。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；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。有意兼容并包，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，唯出于真爱好，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，而后尽管复杂，却维系得住。——这方是真器局、真度量。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，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，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，次则胡适之先生。且不

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，但都有一种本领，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。胡先生额脑明爽，凡所发挥，人人易晓。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，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，每发一论，辟易千人。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。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，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，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；陈先生就不同了，在校内得罪人不少，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，而且细行不检，予人口实。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，便不得存立住。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？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，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，对他的言论、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。——不是蔡先生，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，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，真同情他，亦不会支持他的。

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，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。此则唯藉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，乃得引发开展。自清末以来数十年，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，至此乃追究到最后，乃彻见根底。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，不复能领导后进，然而今日的局面、今日的风气（不问是好是坏）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。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。自然，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、胡二位，例如李守常（大钊）、顾孟馀、陶孟和、周树人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，俱亦各有各的神通。所有陈、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，蔡先生皆未必能作，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，却不得聚拢在北大，更不得机会发抒。聚拢起来，而且使其各得发抒，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。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。

这时，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的聚拢包容之中，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，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；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，那是自有辜汤生（鸿铭）、刘申叔（师培）、黄季刚（侃）、陈伯弢（汉章）、马夷初（叙伦）等诸位先生。我只

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，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。于此，我们又可以说，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，更且能培养许多人。除了许多学生不说，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。

我到北大任讲席，始于民国六年，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，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长之时。蔡先生之知我，是因我有《究元决疑论》之作，发表于上海《东方杂志》（约在民国五年夏连载于六、七、八三期，后来收入东方文库为一单行本）。此论之作盖兴感于黄远庸先生之惨死。那时，我在北京得到远庸从上海写给我的信，同时读到他的忏悔录（渡美舟中作，发表于《东方杂志》），随亦听到他在美国被刺的讯息。此论发挥印度出世思想，指示人生唯一的路在皈依佛法。原稿寄给章行严先生（士钊），适章先生奔走倒袁离沪，为蒋竹庄先生（维乔）所得，付《东方杂志》刊出。不久袁倒黎继，蔡先生既应范公之请，由海外返国。我以自十几岁爱好哲学，很早读到蔡先生的《哲学要领》一类著作，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（民国元年我为新闻记者，蔡先生为阁员，见过几面），特因范公介绍晋谒先生于其家。不料一见面，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。

记得有一天，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（独秀）相会于校长室，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（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，相当于今所谓文学院院长）。我说：“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？印度宗派那么多，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。要我教，我是没得教的呀！”蔡先生回答：“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，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？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，横竖都差不多。我们寻不到人，就是你来吧！”我总不敢冒昧承当。先生又申说：“你不是喜好哲学吗？我自己喜好哲学，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，我此番到北大，就想把这些朋友，乃至求知中的朋友，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，彼此切磋。你怎可不来呢？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，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。”他这几句话打动了，我只有应

承下来。

虽则答应了，无奈我分不开身。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鎔西先生（耀曾）担任司法部秘书，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（钧儒）。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，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。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，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。正在南北初统一，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，我常常忙到入夜。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，况且要编出讲义，如何办得来？末后，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（丹）为我代课。

及至次一年，经过张勋复辟之役，政府改组，鎔西先生下野，我亦去职，南游入湘。十月间，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，大掠而北，我亦不得安居，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，就回北京了。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，写了一篇《吾曹不出如苍生何》，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“国民息兵会”，共同制止内战，养成民主势力。自己印刷数千册，到处分送与人。恰这时许先生大病，自暑假开学便缺课。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，于是才到北大。

我在北大前后共七年，即自民国六年至十三年（从新思潮的酝酿、五四运动的爆发，到国民党改组），中间曾因脑病求去两次，皆经蔡先生恳切挽留而留住，其详不烦说了。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、诸同学所获益处，直接间接、有形无形，数之难尽。总之，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。论年辈，蔡先生长于我廿八九岁，我只算得一个学生。然七年之间，与先生书信往返中，先生总称我“漱溟先生”，我未尝辞，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。盖在校内原为校长、教员的关系，不敢不自尊，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。后来离校，我每次写信，便自称晚学了。

近年，四川报纸有传我初投考北大，未见录取，后乃转而被聘为教授等，非事实。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（那时蔡先生以讲师聘我，亦非教授）。不过，我初到北大时，实只二十四岁，与诸同学年齿相若，且有比我大两岁者。如今日名教授冯友兰、顾颉刚、孙本文、朱谦之诸君皆当日相聚于课堂的。更有少时与我为同学

友。而其时却正求学于北大的，如雷国能（在法科）如张申府（崧年，在理科）诸兄是。

当时蔡先生为什么引我到北大，且再三挽留我呢？我既不属新派（外间且有目我为陈、胡的反对派者），又无旧学，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！此即上文所说，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爱好，极广博的兴趣之故了。他或者感觉到我富于研究兴趣，算个好学深思的人，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；同时呢，他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、中国文化等等自亦颇感兴味，不存成见。这就是一种气度，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具来的。换言之，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，或有独断固执脾气的人，便不会如此了。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有的。老实说，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亦同属必要吧！

由于蔡先生爱好哲学，又请来有哲学兴趣的教员，亦就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。在我眼见的七年中，哲学系始终是最重要的一个学系。当其盛时，比任何一学系的学生都多。除了注册选修哲学课程者外，其他学生自由来听讲的亦很多。校外的人（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、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，还有些不是学生的人）经常来听讲者亦颇有之。注册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，就为按照注册人数，安排的教室本可以容纳下，而临时实来听讲的人数却加多，甚至加多达一倍，非掉换大教室不可。依我自己的经验，当民十二及十三年上半年，我讲儒家思想时，必须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，通常听讲人数总在二百左右。到课程结束，举行考试时的试卷，亦有九十多本。此即正式注册的学生了。闻人言，近年（指抗战前和抗战中）南北各大学哲学系学生少得可怜，几乎没有人愿入哲学系。此固一时风气不同，然亦可见蔡先生当年倡导总算成功。

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成功——他能罗致人才，能造成学风，能影响到全国大局，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。其成功之由果何在？我可以告诉你：此无他，他只是有

他的真好恶。何谓真好恶？儒书上指点得明白：“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”便是。有真好恶，而后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，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。这样，他便能打动人。人或者甘心愿跟着他走，或随着他，有一段鼓舞于衷而不自知。朱晦庵尝说的一句话：“是真虎乃有风”，正谓此。他不要笼络天下人，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。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，他都不用，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。他毕竟成功了，毕竟不可磨灭地成功了。反之，那些玩手段的欺人自欺、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，却每每白费力气，落得一场空。这亦就是儒书上“不诚无物”一句话了。

总之，我所了解的蔡先生，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，一面率真。他之有容，是率真的有容；他之率真，是有容的率真。更进一层说：坦率真诚，休休有容，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。

今者距新思潮之风动全国既二十年，距余之离开北大亦既十七八年，距蔡先生之身故既满两年，而余亦寝寝五十之年矣。自顾尚无所成就以答蔡先生之知遇，以报北京大学之培养。窃不敢妄自菲薄，将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建设的工作，无使蔡先生之精神徒如过去新思潮所表现者而止，而更有其最后之成果焉。是则区区心愿之所在也。因纪念蔡先生，并志于此以自励。

附记：

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一年，即一九四二年。一九七〇年忽于乱纸堆中发见吾手稿原迹，计经二十有八年矣。既审视其不无可存，则重为抄录一通，复就回忆所及五十年前之往事附记于其后。

文中说蔡先生有多方面之爱好，极广博之兴趣，其可征之事例甚多。今试举其一，尔时（约在一九二七），京中有蜀人张克成先生宣讲佛家唯识论著于广济寺，任人听讲。蔡先生时出任北大校事非久，竟然拨冗偕友几次往听。其实，张先生信佛虽笃，却不通唯识，其错解可笑，愚著《唯识述义》曾指出之。然蔡先生之好学岂可及耶？

文中说北大哲学系尔时之盛况，曾及一九二三——一九二四年愚讲儒家思想时来听者之多。却须知听众非尽属思想上的同调，为求学习而来者。愚曾闻有反对派来听。（注：同学中有彭基相、余文伟以我为唯心主义，夙示反对，倡言“我听听他荒谬到什么地步”）此正见出当时思想自由活泼之气象，凡哲学界所以成其盛况者诎不在此耶？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记

又文中“他不要笼络天下人，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，……反之那些玩手段的欺人自欺，亦或自觉得一世之雄，却每每白费力气，落得一场空。这亦就是儒书上‘不诚无物’一句话了。”盖有感于当时执政者蒋介石而发。时当抗日战争中期，百事望之于蒋，而误于蒋，深有慨于心也。

同年十一月八日又记

此文纪念蔡先生兼及当年愚受任北大哲学系讲席之事，因回忆往昔同学盛况如次，计同班同学有孙本文、顾颉刚、冯友兰、黄文弼、朱自清诸君。其时我二十四岁，论年齿彼此大致均相若。班上唯一年长者为谭鸣谦，即是后来革命运动中出名的谭平山其人，他年近三十矣。同学诸友固远不止此数，此举其后来学问上各有造诣，且均为大学的名教授，我此一时偶尔回忆中者数人而已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漱溪识

我以民国六年受聘于北京大学，民国十三年辞离北大，计首尾七年。七年之间所熟识交好者初不止于哲学系诸同学，而泛及于其他科系，如罗常培、罗庸皆国文系，如陈政则德文系，如叶麀则理科，如黄艮庸则在预科，朱谦之（自由听课，不属任何学系）、王恩洋（旁听生）、谷源瑞则属哲学系。后因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而特别相熟，至如王星贤（英文系）虽在学校时不相知，而晚年来过从颇密，十分契合。

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再识

纪念梁任公先生

民国三十二年一月

梁 漱 溟

今天为梁任公先生逝世第十四周年，友人张旭光、周之风诸君提议撰写纪念文。去年，漱自香港返桂，尝应友人囑写有蔡子民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文一篇。愚往昔既同受知于蔡、梁两先生，则兹于纪念梁先生之文，自不容辞。纪念蔡先生文中曾指出蔡先生之伟大处，复自道其知遇之感。今为此文，大致亦同。

怎样认识任公先生的伟大

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，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。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。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，而且，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，冲破旧罗网，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。然而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，论年辈应稍后，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。就在近五十年之始，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。在距今四十年前，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。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，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。当他的全盛时代，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（蔡先生诚早露头角，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）。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，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。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（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），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。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，不过近二十年的事。

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，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，接受他的领导，其势力之普遍，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——如康有为、严几道、章太炎、章行严、陈独秀、胡适之等等——所赶不及。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。康氏原为任公之师，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，接受他的领导，但是不数年间，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，而掩盖了他。但须注意者，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，象是他登台秉政之年（民国二年、民国六年两度），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。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，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。民国八九年后，他和他的一班朋友蒋百里、林长民、蓝志先、张东荪等，放弃政治活动，组织“新学会”，出版《解放与改造》，及其学社丛书，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，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。

因此，论到所给予社会影响之久暂比较上，任公每又不如其他的人。所以有人评论他几句话：其出现如长彗烛天，如琼花照世，不旋踵而光沉响绝，政治学术两界胥不发生绵续之影响。——此正任公之特异处。（《思想与时代》第十三期陈伯庄通讯）这是很对的。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，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，不可马虎混同。任公的特异处，在感应敏速，而能发皇于外，传达给人。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，最善发挥，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，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。象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，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，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。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，而蔡先生却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。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，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，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，亦由此而定。

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，一个善将兵，一个善将将。蔡、梁两先生比较，正复相似。蔡先生好比汉高祖，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，却能收合一批英雄，共图大事；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，正如韩信将兵，多多益善，自己冲锋陷阵，所向无前。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，为蔡先生所不及。